



清幽静雅的淶江书院入口



日后成就旷世伟业的左宗棠,其事业起点便源于淶江书院的机缘



太屏仙山,唐大将尉迟敬德建吴楚古寺,名相房玄龄撰碑文,用战斗情谊共同完成了一篇醒陵的外来文学作品,书写了醒陵人的新骄傲



靖兴寺旁的千年古樟,王阳明二过醒陵,在此留下“老树千年惟鹤住,深潭百尺有龙蟠。僧居却在云深处,别作人间境界看”的豪迈诗篇



淶江书院内的朱熹石刻造像,现代《辞海》朱熹条目下选用的朱熹画像就是这幅石刻像



淶江水一路悠悠漫过流星潭,流过状元洲,穿过淶江桥,却在西山脚下回观眺望,然后在西山脚下回观眺望,然后在西山脚下回观眺望...

这是一座占地近七千平米的书院,讲堂、内厅、高堂和考棚都是清代风格。史书告诉我们,这是清道光九年(1829年)在原西山书院基础上重修的建筑...

江书院的记载。如果再追溯,我们会发现,这个内陆小县,自南宋至清代,竟然在淶江两岸相继办过七座书院,吸引过最顶尖的学者前来讲学授徒。

沿着历史的脚步,拨开时空的遮掩,我们会发现一座文化意义上的淶江书院。她容纳万端、兼收并蓄,浸润湖湘之韵,是醒陵人的精神家园,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座重镇。淶江书院的前世今生,就是一部生动的醒陵文化演变史;淶江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历程,就是一部醒陵人的心灵史。

株洲文脉

斯文一脉

淶江书院,那些文人们的沧桑往事

徐峰

醒陵人文滥觞

自东汉置县以来,醒陵之名千年未易,只是这个小县城就像南方的众多城市一样,是中原文化所忽视的南蛮之地。直到西晋永嘉之乱,晋室东渡,南方社会文化大发展,醒陵一地开始留下文人骚客的足迹...

来文学作品,书写了醒陵人的新骄傲。

大唐帝国广袤的国土给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。醒陵这一“吴楚咽喉”,开始接纳越来越多的文人,并在一次次的接纳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底蕴。

著名诗人杜甫曾在“一雨三秋色”时登临醒陵寺小阁,感叹“白日生新事,何时得暂闲”;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已在这里写诗寄给明月僧,表示“要上诸峰去,无妨半夜行”;而李群玉则在这里写下“别酒离亭十里强,半醒半醉引愁长”的传奇诗句...

公元904年的一个五月天,晚唐著名诗人韩偓来到了醒陵。这个生在晚唐乱世的诗人,空有忠君报国之心,却被权臣朱温迫害,一再被贬,离庙堂越来越远,心也越来越寒,最后弃官南下,过湖北、进长沙,辗转环顾以求避乱之地,直到被步步胜绝、山水益秀的醒陵吸引而停驻下来。

虽然韩偓来醒是“贵就深僻,以便疏慵”,但在流寓醒陵的一年多的日子里,感受了韩偓的才情和胸怀。韩偓是慷慨的,在一年多的忧伤避世中,留下了12首优美诗篇,成为醒陵也是中国文学的珍贵财产。那句“偷生亦似符天意,未死深疑负国恩”,写尽自己未能杀身报国的痛苦心情,深深影响着后世文人。

另一个与醒陵结缘的,是唐朝名相房玄龄。唐贞观十三年(639),大将尉迟敬德出巡案到达醒陵的大屏山(今王坊镇境内),见此地势险峻,云雾缭绕,林木丰茂,谷泉涌流,就在这建寺。寺院建好了,这么一件功德大事,总要写篇文章刻成碑记载下来让后世称颂吧!由谁来写呢?他想到了昔日同在秦王府今朝同在君王殿的宰相房玄龄。

在遥远的长安城里,房玄龄凝神挥毫,运笔成风,一挥而就。在这篇88个字的碑文里,他既肯定了醒陵“远瞻昆仑,近缀衡庐;南通闽广,北达荆吴”的重要地理位置,也毫不吝当地用“威振山河”、“公心如山”这样的文字称颂建寺者。大唐帝国的两位开国元勋,用战斗情谊共同完成了一篇醒陵的外

如果说唐代及以前的文人不经意间在醒陵种下了人文之树的话,那么,宋明两朝则让这棵树变得茁壮起来。

首先站出来的是大文学家欧阳修。在他的文集中,我们可以看到一篇叫《御书阁记》的文章,讲的是醒陵王仙登真观因藏有唐玄宗御书“王仙登真之观”六个大字,宋太宗取去阅后归还并另赐御书“白字”的事。这是一篇典型的欧体文章,严谨简洁地叙述宋太祖为醒陵登真观赐御书“白字”的记由,反映出醒陵人文历史的积淀,引起了这位文坛领袖的重视。

到了南宋,更多的文人与醒陵结缘。第一位是李植,泗州临淮(今江苏泗洪县)人,曾为康王赵构府僚,“靖康之变”后,因文韬武略出众,升为户部员外郎。时值秦桧当道,李植愤然辞职,寓居醒陵,十九年杜门不仕,耿耿耿耿,辉映醒水。

李植之后,往来醒陵的文人就更多了。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之一的杨万里途经醒陵遇雨,感到“寒从平野有,雨傍远山多”;范成大到广西桂林去当知府,从江西出发经过醒陵,看到“淶水桥边绿,门前柳已黄”,感叹“湘东二月春才到,恰有山樱一树花”;江西诗派著名诗人刘克庄《过醒陵》时发现“市上但音多楚语,桥边碧色是湘流”,想到自己失意江湖,不禁“目断羁魂起暮愁”……

而号称“东南三贤”的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(字东莱)的前来,则让醒陵成为湖湘文化的重镇。

1165年,张栻在长沙授徒传业,很快声名远播,湖湘学派极盛。热烈的学术活动激发了朱熹的湖湘之行。

1167年8月,朱熹从福建建安出发,过湘赣古道,经醒陵而至长沙。在岳麓书院,38岁的朱熹与35岁的张栻以辩诘的方式,把自己的学术思考自由地呈现在湖湘学子之前,“论《中庸》之义,三日夜而不能合”,当时陪同朱熹而来的弟子范念德如是记述道。

在长沙,朱熹一待就是两个多月,与张栻讨论了相当广泛的学术问题,其间还应邀到长沙的城南书院讲学,并与张栻同游南岳,而后自南岳返醒陵(今株洲)始分别。

顺着来时的反方向,朱熹又一次到了醒陵,与上次行路匆匆不同,这一次朱熹在醒陵停留了两日,并在青云山的县学官(淶江书院前身)开坛讲学,醒陵士子“肃衣冠而至”。后来,醒陵人在他设坛讲学的地方立起了朱子石像,现代《辞海》朱熹条目下选用的朱熹画像就是这幅石刻像。对朱子的崇拜和景仰,经过了历史的考验。宋以后历朝历代,即使是烽火喧嚣,救死不暇的年代,醒陵人都像保护自己的祖宗牌位一样保护着朱子的石像,这其中躲过了日寇的铁蹄,也熬过了“文革”的浩劫。

同样在1167年,得知朱熹北上的吕祖谦东来,选择醒陵作为会面之所。只是,当日吕祖谦匆匆赶到时,“阶前梧叶已秋声”,朱熹早已飘然远去。更让吕祖谦难过的是,朱熹已经在这里掀起了一片理学热潮,浙东学派的心学似乎没有了位置。我们很难想象他当时的心情,是继续追随朱熹的脚步,还是回到金华老家?是接受浙东学派的失势,还是证明浙东学派同样伟大?历史告诉我们,年届三十的吕夫子在醒陵治北三十里的简家冲创立书院,用人们很不习惯的金华话大力宣扬其学说。

醒陵人没有所谓的门户之见,只要是真正的学问,都接受。所以,东莱书院一开张,“醒人望风景,争相亲炙”。面对淶水两岸的莘莘学子,这位学术大师不忍离去,在湘东红壤松泉中的陋室里寓居三年。这时的朱熹,早已驰骋于众多名山书院间,令脱身不得的吕夫子好不懊恼!后来,淶江书院(县学官)缺教员,昔日的朱子阵地向他发出了延席邀请,厚道的吕东莱又不得不往返于城乡之间,苦苦支撑着淶江、东莱两片讲台,在醒

书院与宋明理学

院传经布道。幸好有张栻在岳麓书院,两地相距不算太远,得以时相往来,互相探访。张栻的每一次造访,对于醒陵的学子都是顶级的文化盛宴。讲学论道之余,二人常在淶江河畔,信步而行,县城南门的一座普通普通的石板桥,因为他们走过,“二圣桥”的名字延续至今。

1194年,朱熹拖着沉重的步履又一次来到醒陵,当年的豪气在滚滚红尘中几乎被耗尽,陪侍左右的两位学生竟是醒陵人,一个是吴猎,一个是黎贵田。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、张栻学术真传的第一人,按史书的说法,“初从张栻学,乾道初,朱熹会试于潭,(吴)猎又亲炙之。湖湘之学一出于正,(吴)猎实表率之。”另一高足黎贵田,早在宋淳熙二年(1175),便在县城南郊创建了第一座醒陵人办的书院—昭文书院,传播朱子之学。在两位爱徒的搀扶下,朱熹再一次来到青山山学官,在自己的石像前长时间驻足,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,却平添许多喟叹,酸楚悲凉溢于笔端:“苍颜已是十年前,把镜回看一怅然。临深履薄量无几,且将余日付残篇。”

“东南三贤”辞世三百年后的1507年,另一位旷世大师踏进了醒陵书院的大门,他就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(字阳明)。在刚刚结束的官场斗争中,他被宦官刘瑾参去兵部主事,贬为贵州龙场的一个小驿丞,赴任途经醒陵,留宿醒洲寺。失却了报效朝廷的机会,也没有了叱咤风云舍我其谁的豪情,在寂寞的贬官路上,落魄的王守仁不忘治学,“水南昏黑投僧寺,还理囊编坐夜长”。让他宽慰的是,醒陵学子请他讲学。宽慰中让他莫可明状的,是淶江书院推崇的先贤中,有抨击心学的朱熹。当年,厚道的吕东莱为了调和朱熹“理学”与陆九渊“心学”之间的分歧,邀请陆九渊、陆九渊兄弟到信州(今江西上饶)鹅湖寺与朱熹见面。谁知双方辩论了三天,不但没有达到吕东莱希望的观点“会归于—”,反而越争越烈,互不相让,最后不欢而散。这一分歧和由此造成的抨击,一直没有停止,而且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提升,心学渐成招架之势。现在,作为陆九渊衣钵的继承者,他要面对传承朱子学说的醒陵学子。

历史给了陆王心学一个“鹅湖之会”后正名的机会。虽然王阳明不喜欢朱熹,在淶江书院的讲学多了几分肃然,少了几分平和,虽然他在讲坛还击和清算程朱理学,把自己反叛条、反传统的学术观点揉进学说之中,可他没有想到,承载过“东南三贤”的淶江书院,并不看重理理学和心学的差异,也不在乎王阳明对他们心目中文化偶像的批评,只要是真正的学问,就会赢得尊敬和赞赏。这让他意外和感动,也让他的讲学更加尽心尽力。

三年后,刘瑾伏诛,王守仁奉诏还京,再次途经醒陵,仍住醒洲寺,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。王守仁再一次开坛讲学,不过这一次他没有了三年前的肃然和对朱子的强烈抨击,表现了对朱子的尊重和对他程朱理学的宽容。兴之所至,王守仁又一次登上了西山,在靖兴寺旁留下了“老树千年惟鹤住,深潭百尺有龙蟠。僧居却在云深处,别作人间境界看”的豪迈诗篇。

1544年,王守仁的门生邹守益来醒讲学,从者甚众。和恩师王阳明一样,他没有排斥程朱理学,而是努力寻求二者的融合,并表现出了对朱熹、张栻和吕东莱的极大崇敬。后来,醒陵人建起醒洲书院(清康熙六年改名文成书院),以纪念王守仁。陆王心学,终于成为醒陵学子的又一圭臬,湖湘学派海纳百川、经世济用的传统,得以保存下来。在王守仁浙江余姚的老家,现代人恐怕很难寻访到他的故居了,而远在千里之遥的醒陵,当年王守仁寓居并作诗的住所醒洲寺仍保留至今。

左宗棠与淶江书院

淶江水不舍昼夜,向西流去。经历过明清巨变的醒陵,书院文化在乾隆年间走向成熟。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淶江书院的重建。

乾隆年间,醒陵先后又建立了江东、近思两座书院,重建了淶江书院。影响最大的是重建于乾隆十八年的淶江书院。在知县曾乐的倡导下,醒陵人在青云山的朱子祠旁,以淶江书院的名字继承了这块土地上全部的文化传统,接过了朱子传经布道的担子。道光年间的知县陈心炳以城市喧嚷不宜治学为由,将淶江书院移建于今址(西山书院旧址)。这里依山傍水,风景秀丽,环境幽静,清爽宜人,是读书人求知、做学问的好地方,醒陵学子从此过上了“百里莺啼喧昼暖,六斋灯火破春眠”的治学生活。

道光十七年(1837),25岁的举人左宗棠来到了淶江书院,出任山长。左宗棠用审时度势、吞吐古今的胆识和才具,为这块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“名教乐地”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淶江书院,他第一件事就是整肃院规和督促教风学风。他以朱子的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三节,爱亲、敬长、隆师、亲友之道”作为院规考察学生,视生如子。从修身齐家入手,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育人目的,左宗棠抓住了教育的实质和根本。紧接着,他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删削了子史经义中空洞的说教,而增加了舆地、兵法 and 农经等课程。

在左宗棠出任淶江书院山长的第一年,这个失意书生获得了快意人生的机缘。两江总督陶澍调任到江西,告假回湖南老家安省亲,途经醒陵。在下榻的县公馆门前,一副对联让这位两江总督怦然心动:

春晖语从容,廿载家山印心石在;
大江流日夜,八州子弟翘首归公。

对联洋溢着对陶澍的赞赏和敬佩,并写出了陶澍一生中的旷世之荣——道光皇帝曾14次召见陶澍,并亲笔为他幼年读书的印心书屋题写匾额。如果这副对联只是让陶澍欣赏,那么走进公馆后又一副对联则让他大为开怀:

一县好山为公立,
两度淶水俟君清。

花甲之年的陶澍心花怒放之余,连连询问两副对联的作者是谁。听说是一位25岁的举人后,陶澍没有兴趣面对地方官员的工作汇报和富绅豪客的高档宴请,当即提出要见左宗棠,并派自己的舆马去接。

气宇轩昂的左宗棠来了,爱才的陶澍一见倾心,决定推迟归期,与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促膝长谈,纵论天下大事。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陶澍的学生,陶澍欣然应允,并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,将自己才五岁的独子陶桃指给左宗棠为婿。

左宗棠的不朽事业由此起步。后来的故事,大凡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。左宗棠成就的旷世伟业,既源于淶江书院的机缘,更少不了淶江书院培养的人才的支撑。他出任陕甘总督,先后有淶江书院门生数百人跟随效力。这些弟子们在左宗棠的调教下,个个都有犁庭扫穴、挥兵千钧的胆识和豪气,著名者有广东提督、统带水师拔萃,甘肃提督余明发,闽浙副将、威镇将军林传榜,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张云级……

1861年,左宗棠率军驰援祁门,道经醒陵。醒陵文武官员匍匐迎接,左宗棠仅领首而已。当见到淶江书院的学子们前来时,左宗棠却立即翻身下马,与之握手,携行十余里,谈笑风生。左宗棠对淶江书院的感情,深厚如斯!

年轻的左宗棠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趣向统驭着古老的淶江书院,那种“一意干将去”的知行合一、身体力行学风,深深影响着近代的醒陵学子,培养了醒陵人喜欢干大事、能够成大局的胆识和气魄;造就了百里同心、万众兴教的民气民风;形成了开放务实、经世济用的教风学风。

近代的淶江书院名噪湖湘声闻海内,醒陵在两千年文化积淀中,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才井喷时代。翻开中国近代史,可以看到宁调元、程潜、李立三、左权、蔡申熙、陈明仁、汤飞凡、黎澍等众多醒陵人以“持之不懈,行之不悔”的湖湘精神活跃在不同领域的最高层面,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天空中璀璨的群星,闪耀着令后世惊艳的光芒。

淶江书院于清光绪三十年(1904)停办,改为淶江高等小学堂。此后多次更名,昔日的学术活动不再,粉壁黛瓦马头墙静隐于西山之腰,日渐斑驳。只有山脚的淶江水,浅吟低唱地流过了左家洲,流向文笔峰,诉说醒陵深厚的历史文脉……